

国学基本教材

大学

张志强 ◎ 编注

中庸



国学
新讲

浙江古籍出版社

国学基本教材

大学 中庸

张志强 ◎ 编注

浙江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学 中庸 / 张志强编注 . -- 杭州 : 浙江古籍出版社 ,
2013.9

国学基本教材

ISBN 978-7-5540-0155-4

I . ①大… II . ①张… III . ①儒家②《大学》—译文
③《中庸》—译文 IV . ①B2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18085 号

大学 中庸

张志强 编注

出版发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电话 : 0571-85176986)

网 址 www.zjguji.com

责任编辑 陈临士 伍姬颖

特约编辑 陆岩军 秦 南

责任校对 余 宏

美术编辑 刘 欣

责任印务 贾 敏

照 排 杭州立飞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富阳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5.125

字 数 13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0-0155-4

定 价 1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国学基本教材”编辑委员会

总顾问：

郭齐勇 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教授

学术指导：

沈渭滨 秋霞圃书院首任院长、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王家范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
葛剑雄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骆玉明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杨国强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李佐丰 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教授
林安梧 台湾慈济大学教授
赵 林 澳门科技大学特聘教授
温伟耀 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
汪涌豪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傅 杰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朱青生 北京大学艺术系教授
王 博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李天纲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徐洪兴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徐志啸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张 觉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张新科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鲍鹏山 上海开放大学传统文化研究所教授
刘 强 同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统 筹 :

孙劲松 向 珂 蒋蔚芳 周金芝

主 编 : 李耐儒

编 委 :

李南晖	陆有富	刘乃溪	徐 骆	须 强
可延涛	李 凯	刘 舫	毛文琦	房春草
李宏哲	张 华	黄晓芳	赵立学	介江岭
张志强	姜李勤	白 坤	晏子然	施仲贞
张 琰	汪佳敏	姚之均	余雅汝	干璐娜

本册编注 : 张志强

总 序

秋霞圃书院创办有年，在民间推动国学普及工作，志在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宗旨，促进古今中外文化思想与学术的交流，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而尽心尽力。其志可嘉，其行可感！

近年，秋霞圃书院耐儒兄主持编撰“国学基本教材”。本套国学教材集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名牌院校的二十多名青年学人，采各种版本的国学读本之长，广泛吸取中小学一线语文教师的教学经验，精心编撰，是中小学生比较理想的国学读本，也是便于教师们使用的、较为系统的国学教材。

读本的篇目有：《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选读》、《幼学琼林》、《诗词格律》、《唐诗选读》、《宋词选读》、《论语》（上、下）、《史记选读》（上、下）、《大学 中庸》、《诗经选读》、《孟子》（上、下）、《左传选读》、《颜氏家训》、《诸子文选》（上、下）、《汉魏六朝文选》、《唐宋文选》、《礼记选读》、《楚辞选读》。每册有指导性概述，有经典原文，有对原文的注释与新译（赏析），并配上文史链接（延伸阅读）、思考讨论等，图文并茂，准确生动，具有可读性与系统性。

梁启超先生说过，《论语》、《孟子》等经典“是两千年国人思想的总源泉，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我们既做这社会的一分子，总要彻底了解它，才不致和共同意识生隔阂”。这就是说，“四



书”等经典表达了以“仁爱”为中心的“仁义礼智信”等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这是中国古代老百姓的日用常行之道，人们就是按此信念而生活的。

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是打通了的。国学具有平民化与草根性的特点。中国民间流传着的谚语是：“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些来自中国经典的精神，透过《弟子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等蒙学读物及家训、族规、乡约、谱牒、善书，通过大众口耳相传的韵语故事、俚曲戏文、常言俗话，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言行规范。

南宋以后在我国与东亚的民间社会流传甚广、深入人心的朱熹《家训》说：“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见老者，敬之；见幼者，爱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人有小过，含容而忍之；人有大过，以理而谕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又说，“勿损人而利己，勿妒贤而嫉能。勿称忿而报横逆，勿非礼而害物命。见不义之财勿取，遇合理之事则从……子孙不可不教，童仆不可不恤。斯文不可不敬，患难不可不扶。”朱子说此乃日用常行之道，人不可一日无也。应当说，这些内容来源于诗书礼乐之教、孔孟之道，又十分贴近大众。它内蕴着个人与社会的道德，长期以来成为老百姓的生活哲学。

王应麟的《三字经》开宗明义：“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这就把孔子、孟子、荀子关于人性的看法以简化的方式表达了出来。儒家强调性善，又强调人性的养育与训练。

清代李毓秀《弟子规》的总序说：“弟子规，圣人训。首孝弟，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以下分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等几部分。这些纲目都来自《论语》。《弟子规》中对孩童举止方面的一些要求，如站立时昂首挺胸、双腿站直，见到长辈主动行礼问好，开门关门轻手轻脚，不用力甩门等，这些规范都是文明人起码应有的，是尊重他人而又自尊的体现。又如：“晨必盥，兼漱口，便溺回，辄净手。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斗闹场，绝勿近，邪僻事，绝勿问。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声必扬。”“用人物，须明求，倘不问，即为偷。借人物，及时还，后有急，借不难。”这都是有助于文明社会的建构的，是文明人的生活习惯，也是今天社会公德的基础。

朱柏庐在《朱子治家格言》起首的一段说：“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些都是平实不过的道理，体现到一个人身上就是他的家教。旧时骂人，说某某没有家教，那是很重的话，让其全家蒙羞。我们不是要让青少年一定要做多少家务，而是要他们从小学就动手打理好自己与家庭的事情，不要过分依赖父母，依赖他人，能够自己挺立起来，培养责任意识。同时，知道一粥一饭、半丝半缕都是辛劳所得，我们能够懂得去尊重家长与别人的劳动。如果我们真的有敬畏之心，就知道珍惜，不应该浪费。

南开中学的前身天津私立中学堂成立于1904年10月，老校长严范孙亲笔写下“容止格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这四十字箴言来自蒙学，又是该校对学生容貌、行止的基本要求。校内设整容镜，师生进校时都要照镜正容色。



后来张伯苓先生治校，坚持了这些做法。

蔡元培先生在留德期间撰写了《中学修身教科书》，该书被商务印书馆于1912年至1921年间共印行了十六版，他还为赴法华工写了《华工学校讲义》，两书在民国间影响甚大，今人将其合为《国民修养二种》一书。蔡先生在民国初年为中学生与赴法劳工写教科书，重视社会基层的公民教育。蔡先生的用心颇值得我们重视，他从孝敬父母谈起，创造性地转化本土的文化资源，特别是以儒家道德资源来为近代转型的中国社会的公德建设与公民教育服务。

现今南京夫子庙小学的校训是“亲仁、尚礼、志学、善艺”。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对孩童、少年的教育，首先是培养健康的心性才情，从日常生活习惯，从待人接物开始，学会自重与尊重别人。

我们今天强调成人教育，因为仅有成才教育是不够的，成才教育忽略了我们作为完整的人、健康的人所必需的一些素养，它在人格养成方面几乎是空白。这不是大学教育才有的问题，而是幼儿园、中小学教育就该关注的。养育青少年的性情，需要家庭、学校、社会的配合。

国学当中有很多修身成德、培养君子人格的内容。中国古典的教育，其实就是博雅教育。传统的教育并不是道德说教，也不是填鸭式满堂灌的教育，而是春风化雨似的，让学生在点滴中有所收获并自己体验，如诗教、礼教、乐教等。

我觉得应该让孩子们处在良好的文化氛围中。家长、老师们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这对孩子们影响很大。家长、老师有义务端正自己的言行，尤其在孩子们面前。要培养孩子分辨是非的能力，多在性情教育上下工夫，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多与孩子交流，洞察他们的情感，并做正确的引导。现在一些家长做不到

以身作则，他们撒谎骗人，打骂斗狠，不尊重老人，这些都会给孩子的成长烙下负面的印记。

我们也希望同学们能趁着年轻记性好，多读些经典，最好能背诵一些，其中的意思以后可以慢慢领悟。南宋思想家陈亮说过：“童子以记诵为能，少壮以学识为本，老成以德业为重……故君子之道不以其所已能者为足，而尝以其未能者为歉，一日课一日之功，月异而岁不同，孜孜矻矻，死而后已。”

本丛书所收经典与蒙学读物中有很多圣哲格言，都足以让我们受用终身。我们一直希望能有多一些的国学经典进入中小学课堂，至少让“四书”进入教材。我们希望能多一些国文课，让中小学生能接受到系统的传统语言与文化教育。中华民族有很多优根性，更需大大弘扬。

是为序。

郭齐勇

癸巳春于珞珈山

目 录

概 述	1	
第一章 大 学	6	
大学之道	6	
克明峻德	11	目 录
苟日新	15	
如切如磋	17	
无情者不得尽其辞	21	
致知格物	24	
诚意在慎其独	27	
修身在正其心	30	
齐家在修其身	33	
治国在齐其家	38	
平天下在治其国	42	
附录 朱熹《大学章句序》	53	
第二章 中 庸	55	
致中和	55	
君子之中庸	59	
执其两端	64	
子路问强	67	
君子之道费而隐	70	
道不远人	73	



居易以俟命	78
齐明盛服	81
大德者必受命	86
父母之丧无贵贱	90
善继人之志	96
五达道三达德	99
唯天下至诚	109
致曲有诚	113
诚者自成	116
至诚无息	119
尊德性而道问学	125
吾从周	128
知天知人	132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136
唯天下至圣	138
附录 朱熹《中庸章句序》	144
后记	147

概 述

《大学》和《中庸》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典籍。我国向来有“四书五经”之说，《大学》和《中庸》便是“四书”中的两种。

《大学》原为《礼记》（即《小戴礼记》，相传为西汉经学家戴圣编撰）中的第四十二篇。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把它从《礼记》中抽离出来，编成章句，单独成书。到了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编在一起，并作注解，称为“四书”。从此，《大学》渐渐成为儒家经典。自宋以后，我国古代知识分子，要想考取功名，首先要熟读“四书”。因为“四书”是国家选拔人才考试的指定教科书。

《大学》对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素养、人生抱负、精神性格起了非常大的塑造作用，同时也促进了我国古代文化以儒学思想为主的基本特征的形成。可以说，这种影响至今仍存在于中华文化的基本格局中。例如，《大学》中的“三纲领”和“八条目”，至今仍然是我国每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有志向抱负的官员的修养准则。

关于《大学》的作者，程颢、程颐认为是“孔氏之遗言也”。朱熹把《大学》重新编排整理，分为“经”一章和“传”十章，并说：“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朱熹认为，“经”是孔子的原话，孔子的学生曾子记录下来；而“传”是曾子解释“经”的话，由曾子的学生记录下来。“经”一章阐述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条纲领，提出了“格



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八个条目是实现三条纲领的途径。“传”十章分别解释“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本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大学》为“初学入德之门也”，被宋代的知识分子推为儒学系统的纲领性作品。它阐述了提高个人道德修养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关系，体现了儒家内圣外王的基本思想内涵和思维框架。《大学》所阐发的根本主旨，是要构建一个良好的国家政治与文化环境，由个人开始，推而扩之整个国家；由内到外，推而扩之整个族群，最终达到“至善”的境界。《大学》提出了“八条目”这样一个序列：修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最为关键。“八条目”的意义在于：我们每一个人应该从个人的修身养性开始，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砥砺自己的人格，培养自己的浩然正气，扩充自己的善良德性，进而推及他人，为自己和他人创造一个积极向上、和谐有序的环境和氛围。可以说，《大学》寄托了古人内圣外王的理想，至今仍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中庸》原为《礼记》一书中的第三十一篇，作者为孔子之孙孔伋，即子思。后虽经汉代学者整理，但影响不大，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到了北宋，由于佛、道盛行，一批儒家知识分子有感于儒学衰落，他们有着强烈的重振儒学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下，儒家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挖掘古代经典的丰富内涵，以便重振儒纲。《中庸》在个人修养以及天道信仰等方面，有着极其丰富的思想内涵，于是理所当然被宋代学人提升到重要地位。《中庸》还被认为是孔门所传授的“心法”，以便与当时的佛、道抗衡。北宋程颢、程颐等理学家极力尊崇《中庸》。南宋朱熹又为之作《中庸章句》，将《中庸》列为“四书”之一，次于《大学》之后。宋、元以后，

《中庸》也同样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古代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朱熹指定的“四书”阅读顺序上来看，“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宋代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第十四，中华书局1986年版）按照朱熹的思路，既然《大学》作为“初学入德之门”，自然也就位于第一篇了，而《中庸》则是学习《大学》之后，循序渐进而达到的最高层次的学习，因而位于最后一篇。这是由《中庸》的思想内涵决定的。《中庸》的思想主题主要在天道、人性、中庸三个层面，可以说是一部古代的哲学著作。用今天的话来说，《中庸》主要讲述了古人的“世界观、人生观、方法论”。

《中庸》讲天道，首先从“天命之谓性”的“世界观”开始，强调人的天性是上天赋予的，人的天性的本质便在于“诚”。“诚”，是每个人内在的德性、上天本然的道理，它在我国古代哲学史上属于本体论的概念。“天命之谓性”确立后，然后就过渡到“率性之谓道”的“人生观”，认为人应该使自己的天性得到彰显，即要由“诚”进展到“诚之”，意思是要告诉人们，人们应该把上天赋予自己内在的美好善良品德，扩充出来、表现出来。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这就需要教育和感化。因此便自然而然引申出“修道之谓教”的“方法论”，它主要阐述了学习“中庸之道”的重要性，尤其要重视“中和”和“诚之”的思想。中和，其实也就是中庸。学习和践行这些道理，都要通过教育来实行，这里面包括学习的方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以及做人的规范（“五达道”和“三达德”），它们的最终目的都是要达到修养的最高境界：至诚。教育和感化的目的，除了要提高自



我修养之外，更多的是要向圣人和君子学习。圣人和君子是一种理性化的人格和道德楷模，根本目的是为了让人们以圣人和君子为榜样，积极向上，扩充自己的善德，尊重他人，敬重万物，树立起“天地化育万物”的和谐观。这样，普通的人在凡俗的生活中，也能够通过学习、教育、修养而达到这一境界。

本书编撰《大学》和《中庸》，采用的底本为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本。原因有三：第一，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影响巨大，它对我国古代知识分子乃至国民性格的塑造起了根源性的作用。无论今天的人们如何对它褒贬不一，但始终不能绕过它。第二，我国古代对《大学》、《中庸》的注释版本不乏其数，但对其理解和领悟得比较透彻和到位的，恐怕还得回归于宋代理学家的注本，朱熹的注解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版本。第三，朱熹本人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为“四书”作注解和解释，并为《大学》和《中庸》的内容作了系统化的整理。除此之外，朱熹还为《大学》作了“致知格物”的补传，调整了《大学》各章的次序，使其在内容上更加合理化。事实上，《大学》和《中庸》正是通过朱熹的重新解释和发挥，而获得了长久不衰的生命力。因此，本书经过综合考虑，慎重选定朱熹本作为底本，并且在章次、排列和部分注释上，均遵照朱熹的做法。

但这并不意味着，本书对《大学》、《中庸》的注释、理解全部照抄朱熹。这是因为朱熹本人的注释和理解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其部分解释也不符合当今的时代精神。这不但是目前学术界的共识，也是现代公民理解古代典籍应具备的基本常识。故本书对这两篇典籍的注释和翻译，参考了多种权威注释版本，力求达意、准确、平易，做到既能够使大众容易接受，又不损失对其深刻内涵的领悟，力求在这二者之间达一平衡。

最后，要告诉读者朋友们：古代知识分子对典籍进行注解的活动，大都为集解、注释、疏解、正义、纂疏等，并非今天的全文翻译。汉语发展到今天，由于种种原因，双音节词增多，单音节词逐渐减少，这为我们阅读古代书籍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其实，古人的原文原句，最富有原汁原味，用很少的字句，就能表达出丰富的意涵，可谓“字字传神”。这种运用很少字词表达意涵的神妙之处，并非今天的翻译能够准确再现出来。一旦翻译，便会失去原味；可是不翻译，又难以进入其门径。这真是所有试图“翻译”古代典籍活动的“吊诡”。因此，我们衷心希望青少年朋友们以及指导孩子阅读经典的家长们，对这两篇文章，一定要多读几遍，不厌其烦地读，认真体会，深入涵泳，不断坚持，一定会有所收获。正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本书根据课时来安排，一般根据朱熹的划分每一章作为一节，但由于朱熹的部分章节划分内容长短不一，因此，我们把比较短小的若干章合并为一节，把较长的章析为两节来安排，并提炼出该节内容中的关键词作为标题。请读者朋友们循序渐进地去学习领悟。